



论田德里亚科夫教育小说中特性角色的道德探索

◎郭红玲

在当代俄罗斯文坛，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田德里亚科夫（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Тендряко́в，1923—1984）被认为是“才华横溢的作家的典范”（凯瑟琳·帕特森，1992：113），他以扎实稳健的创作为自己赢得了文名而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大胆揭露社会问题著称的“奥维奇金派”的一员，也影响了一大批当时的青年作家。^①在英美编选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集中，田德里亚科夫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有西方学者认为：“田德里亚科夫——他是奥维奇金集团里最有前途的作家——”（江川卓，1982：38）他在世时发表的作品主题集中在揭露战后苏联农村生活中官僚主义的罪恶与腐败现象、提出“良心审判”命题和探讨青少年教育问题上。田德里亚科夫去世后发表的一系列遗作又因其更强的揭露性与批判性成为20世纪80—90年代苏联“回归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即已开始关注田德里亚科夫的创作成就，认为其在展现苏联社会现实时客观直率，抓住了苏联社会的本质，大多数作品涉及对道德及人类良心问题的探讨，其创作方法不同于官方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属于心理现实主义。此后随着作家创作成果的日益丰富，相关研究也进一步深入：20世纪70年代的关注点集中在道德、宗教等主题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田德里亚科夫的一系列遗作发表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学者们又将《向幻象开刀》视作其代表作，并以“元乌托邦”（meta-utopia）或“反乌托邦”（dystopia）概念进行解读。有学者认为，田德里亚科夫的文学成就是应在其过世后被重新估价，理应获得更高赞誉。国内学界对田德里亚科夫的接受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受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影响，田德里亚科夫与其他一些苏联当代作家曾被我国评论家撰文声讨过，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内政治大环境的改善，田德里亚科夫及其作品开始被更多地译介过来，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其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20世纪70—80年代的道德题材小说。国内学界普遍重视田德里亚科夫在暴露苏联社会根本问题和社会道德探索上的成就，指出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强烈的伦理性。

^① “弗·田德里亚科夫的创作道路曾经对六十年代的青年作家产生过很大影响。有的评论家（如叶·西多罗夫）认为苏联文坛上的一些后起之秀，如瓦·舒克申、瓦·别洛夫、费·阿勃拉莫夫等，都是沿着田德里亚科夫的道路前进的。”见钱诚《田德里亚科夫及其〈六十支蜡烛〉（代序）》，田德里亚科夫·六十支蜡烛[M].钱诚，吴新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田德里亚科夫被认为是苏联文学道德探索历程中具有承先启后地位的重要作家。相较而言,国外学界有关田德里亚科夫的研究更为全面、丰富,国内学界的研究在广度、深度上都还相对较弱,有待进一步深入。

田德里亚科夫的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在被西方学者普遍视为是其代表作的《向幻象开刀》中,田德里亚科夫着力塑造的主人公格雷宾在进行了一番探索后,“他的结论是,人们渴望某种道德力量来对抗仅仅服从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冲动。他发现人性中存有一种即使微弱(但仍不可忽视)的‘乌托邦’冲动,以此寻求正义和幸福。”(伊迪丝·科洛斯,2014:173)可以说,在其一生的创作中,田德里亚科夫都没有离开过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无论是早期被归入“奥维奇金派”的农村题材小说,还是中后期的道德探索小说,他都将笔触直接对准当下生活中的人们,关注现实,关注日常生活,将人物放入现实感强烈的矛盾冲突中加以刻画,并且常常让人物遭遇道德困境,在人物对自身行为的反省中思考是与非、善与恶、对与错、好与坏……在人物剧烈的内心冲突中,作者向我们展示艰难的道德探索之路,并由此进入更为深邃的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入反思的空间。在这些作品中,道德探索主题最为集中、探讨也最为深入的是《惩罚》(1979)和《六十支蜡烛》(1980)。本文试以此两部作品来分析其在道德探索 and 现代文明反思两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1 胜利者与失败者集于一身的英雄形象

在《惩罚》与《六十支蜡烛》中,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两位作为中心人物的有着几十年教学工作经历的老教师形象——《惩罚》中的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老师和《六十支蜡烛》中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叶切文老师。他们都兢兢业业,以认真做好教育工作培育出好学生为己任,他们也都自认为是尽职尽责的好教师,以为会在不久的将来顺利退休。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他们打入思想的冷宫,他们胜利者的姿态由此转变为失败者的颓丧与失望,继而陷入深沉的自省与反思中。

《惩罚》中,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原是一名参加过战争的近卫军大尉,在战后做了教师。战争中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人性的不可泯灭,从事教育工作后的他努力激发每个学生身上潜藏着的高尚的道德力量。他坚信,教师的神圣职责就是让学生认清人们之间的关系“高尚与卑鄙、诚实与虚伪、光明磊落与阴险奸诈、崇高的道德与卑鄙行为等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田德里亚科夫,1979:241),然后,把每个学生都变成炸开周围冷酷环境的雷管,不容忍罪恶并坚决与之斗争,最后成为品德高尚之人。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赢得了学生家长的尊重、同事的肯定和上级教育局官员的表扬,成为他所在的第一百二十五中学的明星教师。他丝毫不怀疑,就此,他确实对历史做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虽微薄却值得肯定的贡献。可以说,他是平凡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英雄形象。与之相比,叶切文的形象似乎更加高大光辉。《六十支蜡烛》的开篇就为我们展现了卡拉西诺市为庆祝叶切文的六十大寿举办的盛大生日宴会场面。年满六十岁的叶切文已从教四十

年，博学敬业、令人敬重，市教育局为其申请了表彰、奖赏，并授予其荣誉称号。叶切文一夜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老教师变成了全市闻名的英雄，甚至他从前的学生也从全国各地发来贺信贺电祝贺他取得的荣耀。叶切文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最令他自豪的是他曾救助过的一个孤儿，正是他在关键时刻的关爱，让这个孩子不致流离失所并最后成长为一名英勇为国献身的海军军官。这都是让叶切文引以为傲的人生资本，他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

学生柯里亚的杀父给了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老师以沉重的一击。这不仅仅是因为打破了“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相信，从他手里出去走向社会的都是品德高尚的人”（田德里亚科夫，1979：241）的美好想象。更重要的是，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意识到，他的理论破产了。柯里亚曾经是个问题学生，但是在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老师手里，这个学生由难以教育变成规规矩矩的了。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一直信奉，历史是人创造的，教师只要教育好学生就可以终止人类无情的历史，但是，就是在他自以为引领学生走向高尚人生境界的过程中，柯里亚打死父亲的一声枪响警醒了他。他痛苦地意识到：“二十年来我所获得的东西，我所相信的东西，自认为能用以服人的东西——统统不顶用了……”（田德里亚科夫，1979：258）“我那些培养高尚道德的说教竟推动了人家去杀人！”（田德里亚科夫，1979：259）人是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矛盾纠结更不可套用简单公式去解决。学生索妮娅的父亲波捷欣的指责更加重了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的失败感与负罪感。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挣扎在失败的颓唐与对未来的迷惘中。在《六十支蜡烛》中，叶切文的失败感最初则来自自身所受到的生命威胁。叶切文经由官方的宣传成为卡拉西诺市教育界的英雄，在他展读各地学生寄来的贺信贺电时，却惊讶地发现其中有一封是控诉叶切文毁掉自己一生的。这位匿名的写信人声称要杀死叶切文，并希望将来对自己的审判变成对叶切文的审判。面对这突然而至充满恶意的文字，叶切文困惑不解、满腔愤懑。他自认没有犯下过任何罪行，似乎无可忏悔。但是，也由此时开始，叶切文追忆过往，想起了被自己出卖而自杀身亡的恩师格劳贝，想起了自己背叛过的初恋塔尼娅，想起了自己对待小女儿薇拉的严苛与冷酷……但是，这封匿名信与他们都无关，而是一个名叫谢尔盖的学生写的。叶切文当年劝说自己的学生谢尔盖在大会上公开谴责名为德国警察实际身份却是地下游击队员的父亲，此事导致了谢尔盖家庭关系破裂。谢尔盖由此精神受到打击并走上了自暴自弃之路。谢尔盖指责老师当年教唆自己对父亲背叛：“您的无私发挥了它凶险的作用！”（田德里亚科夫，1985：201）叶切文痛苦地反省自己的一切，意识到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教育观，甚至还应该包括最基本的人生观、道德观。

2 “特性角色”的道德反思与现实困境

如果我们认为田德里亚科夫在作品中仅仅关注并探讨了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那我们的理解就太过狭隘了。“在许多方面，田德里亚科夫笔下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是苏联

无神论精神危机的缩影，由此指出了晚期苏联共产主义内部更广泛的危机。”（维多利亚·斯莫尔金，2018：195）我们应该看到，田德里亚科夫真正想要通过这两部青少年教育题材的作品深入探讨的是当代人因陷入社会道德困境而遭遇的精神危机，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现代文明悖论。

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曾提出“特性角色”（character）这一术语，指“从道德上使一种社会存在的模式合法化”（麦金太尔，2011：37）的一类社会角色。“一种特性角色被文化的一般成员或其重要部分视为目标。他们提供一种文化理想与道德理想”。（麦金太尔，2011：37）麦金太尔为此“特性角色”所举的几个例子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公立学校校长、探险家、工程师和德国威廉时代的普鲁士官员、教授和社会民主党人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能对社会的道德塑形产生重大影响。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与叶切文就是接近于麦金太尔所谓“特性角色”的人物形象。公认的优秀教师身份让他们足以成为社会上的道德标杆并对周围人群的道德观念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看到，作者恰恰是选取了这两位“特性角色”为主人公，并在作品中让他们深刻体验了道德困境，进行了艰难的道德反省。

无论是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还是叶切文，他们的前半生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都是幸运的。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亲历过残酷的战争，叶切文也曾经有过贫寒困窘的童年，但他们始终未受到过大的伤害。事业上的顺利使他们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英雄角色的构建是源于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或者说，他们在不自觉之中充当了主流政治话语的代言人，他们的成功，实际上是统治者权力意志的成功。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教导孩子们要传播理智、善良和永恒，不要惧怕罪恶，要与坏人坏事做斗争。但是，判断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是按组织教给自己的还是经由自己的思考判断得出的？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忽视了这一点。在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官方有着明确且不容置疑的判断。在是否可以杀人这一点上，作者也通过学生斯拉瓦之口传达出官方所给予的现成答案：“是的，为了生命，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杀人！——热里亚包夫、彼罗夫斯卡娅、斯杰潘·哈尔图林都曾经运用过！现在，人们给他们著书立传，在历史课上也讲……”（田德里亚科夫，1979：286）所以，索妮娅坚信柯里亚弑父的正义性：“杀人，是为了能活下去！”（田德里亚科夫，1979：260）“历史上常有人为了正义而杀人，人们把他们看作英雄。”（田德里亚科夫，1979：297）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的教育下，柯里亚举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诚然，酗酒、施暴的父亲给家庭带来了不幸，但柯里亚此举无疑是害人害己的。对此，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的反省是深刻的：“我责备自己只相信那些漂亮的、骗人的准则，无形中用这些东西欺骗了你们！……”（田德里亚科夫，1979：284）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不自知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种“遵命”的“美德”在叶切文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在集体智慧的“代表”苏柯夫“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劝说下，为了所谓的“革命”，十五岁的叶切文在大会上批判了亦父亦师的格劳贝。格劳贝痛感对叶切文教育的失败，服毒自杀。叶切文由此保住了自己，却也失去了最心爱

的姑娘——格劳贝的女儿塔尼娅，同时失去的还有真理和善。小女儿薇拉曾是叶切文的希望，但因早恋怀孕而被代表官方正义的叶切文斥责“道德堕落”，在叶切文的坚持下，薇拉被开除出校。叶切文劝说学生谢尔盖公开谴责自己父亲的做法正与当年苏柯夫对叶切文的劝说如出一辙，叶切文已由当年的被动接受主流话语彻底转变为话语的代言人了。在自己的历史课上，叶切文对历史的评价也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评价的转变而转变。叶切文自问是诚实之人，但是这种诚实的实质，作者借由年轻教师列杰涅夫的一番话为我们指明：“您所说的诚实就是要根据‘请随意吩咐’的原则办事！那是遵命诚实！一旦接到新的命令，这种诚实便可以像更换一件脏衬衣似的被更换掉！请问，您这种无原则性的诚实同无原则的胆小怕事究竟区别何在？”（田德里亚科夫，1985：85）

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和叶切文都痛感过往之错，他们的反省是深刻多面的。首先，对生活的重新认识。生活的本来面目是复杂的，简单一刀切的善恶观既违背现实逻辑又会对人造成严重伤害。柯里亚在牢狱中回忆与父亲相处的温情瞬间时体味到的痛苦，叶切文想到自己当年冷酷对待女儿导致女儿不幸时的追悔，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与叶切文听到学生们残酷无情的杀人逻辑时所感到的痛心，都是尝到了在“惩恶”名义下的简单粗暴生活哲学酿出的苦果。其次，对是非善恶的重新评判。影响叶切文前半生的是非观最初来源于学校领导苏柯夫：真理在于清贫，财富代表肮脏；集体的智慧永不犯错误。叶切文自白道：“苏柯夫把我纳入了一条轨道，我沿着这条轨道行驶了四十年，直到今天。”（田德里亚科夫，1985：37）这样的是非观导致了真正有人情味的格劳贝老师的绝望自杀，叶切文失去了纯真善良的初恋情人塔尼娅，懵懂学生谢尔盖亲手毁掉了原本温暖的家庭关系……叶切文做到了“遵命诚实”，但这种诚实是面向强权的、隐含个人自保意图的诚实，远离了真正的出于美德对是非的判断。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认为，善绝不等于金钱、荣誉或快乐，善是“当一个人自爱并与神圣的东西相关时所拥有的良好的生活状态以及在良好的生活中的良好的行为状态。”（麦金太尔，2011：187）使一个人获得至善的品质就是美德，而核心的美德是智慧。缺乏智慧判断只知遵命听话就无法有真正合于生活逻辑的是非善恶观。反省中的叶切文内心独白道：“俗话说得好，愚蠢之为害甚于盗窃。”（田德里亚科夫，1985：83）那么，智慧从哪里来？这恐怕是作者自己也在追问的问题。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意识到“糟糕的是总共只读过一本书的人。危险的并不是毫无知识的人，危险的是那些一知半解的人”。（田德里亚科夫，1979：290）在《六十支蜡烛》中，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年轻教师列杰涅夫的形象，他不满于现行教育体制的僵化与教学内容的单一，敢于反抗权威，为学生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叶切文对列杰涅夫的态度由厌烦转为认同，也说明了这是希望之所在。只有认识到并学习人类多种多样的灿烂文化成果，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与美德并臻于至善境界，才能避免盲目遵命导致的愚昧恶果。再次，对人类基本伦理的重新审视。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影响深远。启蒙思想家们极力宣扬理性，并以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恩格斯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

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者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恩格斯，1974：56）凡是阻碍新人前进的一切都会被无情地掀翻。父权作为旧的社会制度的重要一面自然也在被抛弃之列。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就为父权的渐逝唱了一曲挽歌。“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它谋求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杨淑静、丁惠平，2009：20）但我们现在已意识到，过去（传统）正是我们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完全抛弃这一部分，我们必然只剩残缺的躯体，这会让我们离善与美德渐行渐远。现代性、现代精神的缺憾正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点点地暴露出来。父亲，正是过去（传统）的象征与代表。塔尼亚认为，要是孩子们连父亲都不认了，世界就会退化。柯里亚弑父后的忏悔、叶切文多年后的反思都确认了这一点。由此，也体现出了田德里亚科夫在这两部作品中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反省过后的纠正是痛苦而又艰难的。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和叶切文都力图走出学校德育中的误区，现实却让他们进退两难。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的上司和同事都反对让老师和学校承担过错，并把罪责推给社会：“您自己尽可以往车轮下面去钻，可是您得保护一下别人呀，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田德里亚科夫，1979：260）“犯罪的因素并不在学校的范围内。”（田德里亚科夫，1979：290）与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相比，叶切文的困境更多地来自自己内心中的挣扎。他想改变自己评判学生优劣的标准，但是他又发现，在自己过去的教导下，听话的学生已然走上不再依靠自己思考判断、只知鹦鹉学舌的道路了。他不忍心让学生代替自己受到惩罚：“好一个‘我想重新做人’，不错嘛！想把自己的蒙昧无知造成的罪恶推到一个少女身上！你可是有个四十年教龄的教师呀！……噢，不，我不会这样做的。”（田德里亚科夫，1985：162）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和叶切文都被困在自己想要正视、纠正错误却又无法违逆环境的窘境之中。这样的窘境也折射出了当时作为揭露批判型作家的田德里亚科夫在文学创作事业中所遭受的非议与阻力：“当时的文艺批评并不总是从正面角度强调田德里亚科夫对生活的积极干预及其作品的现实性，相反，常常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试图使其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严格框架。”（伊克拉莫夫，1985：590）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和叶切文作为代表所处社会道德哲学的“特性角色”进行反省，具有特殊的典型性，这实际上也正说明了七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整体在道德评判上的逐渐转向和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

3 道德探索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在《惩罚》与《六十支蜡烛》的结尾，田德里亚科夫并未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寻求警察苏里莫夫的帮助，要求以证人身份出庭呼吁舆论的支持；叶切文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用余生勇敢地去改革创新点什么。阿尔卡季·基里洛维奇和叶切文到底将如何摆脱困境，他们的行动是否有效，他们的未来生活如何，作者对

此没有继续展开书写，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不是作者最关心的问题。作者通过这两部作品最想传达给读者的，是代表社会文化与道德理想的“特性角色”的反省本身，是对现行道德标准的质疑与重新展开探索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本身，或许，这就是真正的答案和希望所在。

“特性角色”的反省是于日常生活中骤然发生的，他们已经形成并巩固了多年的人生观在惯性向前滑行中遭遇了被动急刹车。在教育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明星、话语权掌有者。但是在生活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认识还留待有偌大的空间让他们去思索与深入。从这个方面来说，田德里亚科夫是以其小说创作在积极地观照现实人生与社会的。19世纪英国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学的实质即是对生活的批评、对人生的批评：“因为人生本身在极大程度上就是‘道德’行为。因此要坚持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诗歌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对生活的评论；诗人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有力而美妙地把思想运用到生活中去，也就是运用到‘如何生活’中去。”（阿诺德，1986：86）深受阿诺德“诗歌即人生批评”的诗学理念影响的英国著名学者、剑桥大学教授F.R.利维斯在其小说批评代表作《伟大的传统》（1948）中认为，作家必须有严肃的道德关怀，强烈的道德意识是伟大小说的重要标志。以此为标准，利维斯在这部著作中梳理了英国文学史上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和查尔斯·狄更斯等伟大小说家的创作成就，阐明了他们在小说中对生活的书写、体验与反思，认为小说本身即是通向理想道德境界的途径。

当然，深刻的道德关怀并非仅仅体现在英国作家创作中。事实上，按利维斯的小说批评观，我们可以发现，在俄罗斯文学历史发展中，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为代表的道德探索传统悠久深厚。苏联当代著名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就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强调：“我肯定，最高道德原则是伟大文学的起点。在道德与不道德、永恒与昙花一现、崇高与猥亵的冲突中，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的大小取决于他的人格如何以及精神境界的高低。”（艾特玛托夫，1986：53）众所周知，苏联社会在20世纪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波折，作为社会生活之反映的苏联文学自然也经历了多次起伏：一体化精神控制时期、解冻时代、停滞时期、回归时期等。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停滞时期又被称作“后专制时代”，这是继解冻时代之后的一个新的政治高压年代，但是，“就思想意识控制的程度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文学是不紧不松。它比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学作品更为教条主义，但是，相对说来，没有斯大林时期那么刻板、僵化”。（弗里德伯格，1983：141）在这一虽然有限但确乎存在的创作空间中，“大多数作家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官方乌托邦神话的解构。这就是以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来逃避官方乌托邦话语的牢笼，以对人的道德殿堂的构建来抵御政治话语的侵入。因此，在整整20年的‘停滞时期’里，艺术成就最显著的恰恰是所谓‘道德题材’的作品”（董晓，2005：253）田德里亚科夫正是当时从事此类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因此他也曾被评论家称为是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家。

从艺术手法上来说，田德里亚科夫的道德题材小说情节编织不够丰富、叙述技巧略

显单一、人物形象刻画不够丰满甚至有些概念化，这是因为“对于田德里亚科夫而言，向读者传达他的思想和忧虑比对他的主人公们进行诗意描述更为重要”（维霍采夫，1986：342）。由此，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18世纪的哲理小说。但不能否认的是，其独特成就在于：在继承俄罗斯文学史道德探索这一伟大传统的基础上，他集中描写人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道德难题，对苏联当代社会中的一些信仰和行为的准则进行了重新估价，其反省之深刻、探讨之深入是同时期我国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未能达到的。

参考文献：

- [1] Kathleen F. Parth é . *Russian Village Prose: The Radiant Pas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 江川卓. 对苏联文学的不安 [M]// 顾稚英, 编选. 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 [3] Edith W. Clowes. *Russian Experimental Fiction: Resisting Ideology after Utopia*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4] 田德里亚科夫. 惩罚 [M]. 戚仁,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79.
- [5] 田德里亚科夫. 六十支蜡烛 [M]. 钱诚, 吴新生,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5.
- [6] Victoria Smolkin. *A Sacred Space Is Never Empty: A History of Soviet Atheism*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 [7] 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 道德理论研究 [M]. 宋继杰, 刘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8] 恩格斯. 反杜林论 [M]//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9] 杨淑静, 丁惠平.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9(5): 20-23.
- [10] 莫·弗里德伯格.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文学 [M]// 顾稚英. 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 [11] 马修·阿诺德著, 蒋贻瑞译. 《华兹华斯诗歌选》序言 [J].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6(3): 84-90.
- [12] Икрамов, К. А. :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Время Владимира Тендрякова» в книге «Шестьдесят свечей» В. Тендрякова. [M]. Известия, 1985.
- [13] 刘宪平, 译. 艾特玛托夫答记者 [J]. 苏联文学, 1986(5): 52-54.
- [14] 董晓.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苏联文学中的两种精神 [M]// 刘文飞. 苏联文学反思.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5]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 С. Выходцев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M].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6.

作者简介：

郭红玲, 女, 1978年11月生, 山东潍坊人, 文学硕士,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